

性别与困境儿童资源分配：基于国内外研究视角的比较分析

王霞

三亚学院 海南 三亚 572022

摘要：本研究从性别视角出发，对国内外关于家庭困境儿童资源分配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系统梳理了性别偏好、家庭结构与父母人力资本等因素对资源分配的影响机制，发现性别是导致困境儿童内部资源分配差异的关键变量。通过比较分析，本研究揭示了我国在困境儿童资源分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包括对非物质资源关注不够和政策体系的“性别盲视”问题。

关键词：性别视角；困境儿童；资源分配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全球范围内，儿童发展不平等现象依然严峻，困境儿童的福祉保障是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在我国推进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困境儿童的精准帮扶更成为重要议题。然而，现有研究多将家庭视为整体，忽视了其内部资源分配的复杂性。

研究表明，在资源有限的家庭中，分配决策常呈现系统性差异，其中性别是关键因素。阿马蒂亚·森提出的“缺失的女性”现象，正是家庭层面性别偏见的极端体现。在困境家庭中，资源约束会放大这种基于性别的分配不公，使女童面临“困境中的困境”——既承受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不利，又因性别遭受内部资源剥夺。这种差异体现在教育投资、医疗保健和父母时间投入等多个维度。例如，在多子女困境家庭中，教育支出常向男孩倾斜；在流动人口家庭中，男孩更可能被选择随迁以获得更优资源。

那么，性别因素究竟如何影响困境家庭的资源分配？其作用机制为何？通过比较分析国内外研究成果，揭示我国在此领域的问题，并为后续优化提供借鉴。

二、性别在家庭资源分配中的作用机制：国内外研究梳理

（一）国内研究现状与发现

国内研究立足于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传统与经济转型背景，揭示了性别在家庭资源分配中的复杂影响，其作用机制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文化规范驱动的性别偏好。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和“养儿防老”观念是驱动资源分配性别差异的核心文化力量。这一偏好不仅影响了极端的人口结构，更在日常的家庭投资决策中体现。刘雯等人（2021）对中国家庭教育支出的研究发现，在多子女家庭或低收入家庭中，教育支出明显向男孩倾斜，呈现出“男孩优先”的模式。

这种偏好尤其在资源受限时被激活，家庭倾向于确保儿子的教育机会，而女儿则可能成为家庭权衡下的牺牲品。陶自祥（2011）从家庭微观视角对大量高额彩礼婚姻现象进行研究，发现其实是代内剥削，具体表现就是家长为了降低儿子打光棍的风险，强迫女儿早婚来准备儿子结婚所需要的高额婚礼支付，这使得家庭资源，尤其是用于婚姻的大宗支出，系统性流向男方。

加剧差异的制度性家庭结构。特定的家庭结构会与性别因素产生交互作用，放大或改变资源分配的格局。其中，流动与留守儿童家庭是研究这一交互作用的典型场域。陶然等人（2011）的研究揭示了流动人口在决定子女是否随迁时，男孩更有可能被父母带往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和生活条件，而女孩则更有被留在农村成为留守儿童的风险。这实质上是将“随迁”这一包含教育机会、亲子互动和城市体验的“资源包”优先分配给了儿子。此外，在多子女家庭中，子女的出生次序和性别组合也会影响分配结果，例如，一个年幼的弟弟可能会剥夺其年长姐姐的高等教育机会。

父母人力资本特征调节性别偏见。父母，尤其是母亲的人力资本是调节性别偏见的关键变量。研究表明，母亲教育水平的提高能显著改善女童的处境。Duflo（2012）在其关于女性赋权与经济发展的综述中明确指出，掌控更多资源的母亲更倾向于将资源投资于子女的健康与教育，且对女儿的投资偏好增强。这一机制在中国情境下同样得到印证。当母亲拥有更高收入和更强决策权时，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性别差距会显著缩小。这表明，提升母亲地位不仅是性别平等的目标，也是促进代际公平和儿童发展的重要途径。

（二）国外研究现状与发现

国外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多元的文化比较视角，从发展中国家的极端剥夺到发达国家隐性的性别刻板印

象,共同勾勒出全球范围内性别与资源分配的复杂图景。

发展中国家的极端剥夺与制度性偏见。在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及部分非洲地区,性别偏见对儿童生存与发展构成了致命威胁。Barcellos 等人(2014)对印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他们发现,在营养和医疗保健这类关乎基本生存的资源分配上,女孩显著处于劣势。与男孩相比,她们在生病时获得医疗服务的概率更低,营养状况也更差。这种极端剥夺的根源在于深植于文化和社会制度中的嫁妆制度,以及儿子在宗教仪式和继承权上的特权,使得女儿被视作“经济负担”,而儿子则是“资产”。

发达国家的隐性偏见与观念延续。在义务教育普及、物质资源相对丰富的发达国家,基于性别的资源分配差异并未消失,而是以更隐蔽的形式存在。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非物质资源和特定领域的投资上。例如,父母可能无意识地在早期教育中为男孩和女孩选择不同类型的玩具和课外活动(如鼓励男孩参与STEM相关活动),在高等教育和专业选择上施加不同的影响。此外,父母的时间陪伴质量也可能存在差异。这些行为的背后,是父母对劳动力市场存在的性别工资差距和职业隔离的预期,以及内化的性别刻板印象在起作用。Duflo(2012)也指出,即使在发达国家,社会福利政策的设计(如儿童津贴的支付对象)也会基于家庭内部资源掌控的性别差异,从而间接影响儿童的资源获取。

三、国内外研究的比较分析与差异透视

(一) 研究视角与方法的比较

1. 研究视角的差异

国内研究更侧重于传统文化和家庭结构等结构性因素的直接影响。研究普遍从儒家文化、“重男轻女”的宗族观念出发,将性别偏好视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外生变量,探讨其如何在家庭内部转化为具体的资源分配行为。同时,对中国特有的流动人口、留守儿童等家庭结构的关注,也体现了研究视角与本土社会现实的紧密结合。

国外研究的视角则更为多元。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研究更关注心理、制度与市场因素的交互作用。例如,探讨父母内化的性别刻板印象如何影响其在不同领域(如STEM教育)对子女的投资,或分析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歧视如何通过预期回报机制反作用于家庭决策(Duflo, 2012)。对于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研究则深入揭示了嫁妆制度、宗教信仰等非正式制度与正

式法律体系在塑造性别偏好中的根本性作用(Barcellos et al., 2014)。

2. 研究方法的差异

在研究方法上,国内外研究均广泛应用微观计量经济学方法,但在数据运用和识别策略上各有侧重。

在数据运用方面,国内研究大量依赖全国性的微观调查数据(如CFPS、CHNS),擅长进行大样本的截面或短面板数据分析。而国外研究,尤其是一些发表在顶级期刊上的研究,更注重长期追踪数据或巧妙的自然实验,以更好地识别因果关系。

在测量焦点上,国内研究对物质资源(如教育支出、医疗费用)的测量已相当成熟,但对非物质资源(如父母时间投入、教育期望、情感关怀)的性别差异测量尚在发展中。国外研究在这方面走得更远,对时间利用调查数据的深入挖掘已成为揭示发达国家隐性性别偏见的重要手段。

(二) 核心发现与共性的比较

尽管存在视角和方法的差异,国内外研究也揭示了一些跨越文化背景的共性规律。

共性之一在于,资源约束激化性别不平等。无论是中国的低收入家庭,还是印度的贫困农村,研究都一致发现,当家庭面临严峻的资源约束时,资源分配的性别差异会显著扩大。这印证了资源稀缺理论,即在“稀缺心态”下,家庭更倾向于依赖简单的文化偏好做出决策,从而导致对女童更为不利的后果。

共性之二在于,母亲是改善女童处境的关键。国内外研究都强有力地证明,母亲的人力资本和家庭决策权是调节性别偏见的核心变量。当母亲拥有更高教育水平和更强经济能力时,她们会更多地投资于子女,特别是女儿的健康与教育(Duflo, 2012)。这一发现具有普适性的政策含义,即赋能女性是促进代际公平的有效途径。

(三) 问题与政策回应的差异比较

1. 国内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在研究层面,主要不足首先体现为对非物质资源的关注不足。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教育、医疗等货币化支出,对父母时间投入、情感支持、教育期望等隐性但至关重要的资源分配的性别差异,缺乏系统性和深度的实证研究。其次,现有研究对异质性的挖掘不够深入。对困境儿童内部的异质性,如残疾女童、流动女童、事实无人抚养女童等特殊亚群体面临的叠加性劣势,研究尚

显薄弱，导致政策靶向性不足。

在实践与政策层面，政策的“性别敏感度”存在不足。我国现行的儿童福利政策多为普惠型，在认定困境儿童和分配资源时，普遍缺乏对家庭内部性别不平等的识别和干预机制。政策工具未能有效触及家庭内部的“黑箱”。此外，法律约束力有限。虽然《未成年人保护法》强调了平等原则，但对于家庭内部基于性别的资源剥夺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强制纠正措施，法律的可操作性有待加强。

2. 国外可借鉴的经验

国外在应对这一问题上，提供了多层次的政策启示。

一是立法与精准的政策干预。一些国家通过立法明确保障女童的财产继承权、教育权。更值得借鉴的是“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等精准干预措施，例如直接向有女童的家庭提供教育补贴，或对女童入学、完成疫苗接种的家庭进行奖励。这类政策通过改变家庭投资的成本-收益计算，直接激励对女童的投资。

二是社会倡导与系统性赋能。通过国家主导的媒

体宣传和学校教育系统，持续挑战和改变“重男轻女”的性别刻板印象。同时，致力于提升女孩自身的权能，通过技能培训、领导力项目等，增强其自信心和未来竞争力，从根本上改变其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价值定位。

三是构建外部支持服务体系。建立完善的社区亲职教育支持项目，为困境家庭提供育儿指导、心理支持和资源链接，从外部缓解家庭压力。这不仅能改善整体亲子关系，也能通过引入性别平等的育儿理念，间接促进家庭内部资源的公平分配。

四、研究结果

研究得出，第一，性别是影响困境家庭资源分配的关键变量，其作用机制呈现文化、经济与制度的复杂交织。国内凸显“投资回报”与“文化规范”驱动，而国外研究还揭示了“社会制度”与“心理观念”的重要影响。第二，资源稀缺会系统性加剧性别不平等，而提升母亲的人力资本与决策权是改善女童处境的有效途径，此为跨文化共性发现。第三，比较显示我国研究存在对非物质资源及异质性群体关注不足的问题，政策体系存在“性别盲视”，难以保障困境女童的平等发展权。

参考文献：

[1] 崔盛, 宋房纺. 父母教育期望与教育投入的性别差异——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实证研究 [J].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报, 2019, (02): 154-168. DOI: CNKI: SUN: RDXK. 0. 2019-02-012.

[2] 刘雯, 於嘉, 谢宇. 家庭教育投资的性别差异. 青年研究. 2021: 5.

[3] 陶自祥. 高额彩礼: 理解农村代内剥削现象的一种视角——性别视角下农村女性早婚的思考 [J]. 民俗研究, 2011, (03): 259-269. DOI: 10.13370/j.cnki.fs.2011.03.013.

[4] 陶然, 孔德华, 曹广忠. 流动还是留守: 中国农

村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地选择与影响因素考察 [J]. 中国农村经济, 2011, (06): 37-44. DOI: 10.20077/j.cnki.11-1262/f.2011.06.004.

[5] Duflo E. Women empower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2 Dec 1; 50(4): 1051-79.

[6] Barcellos SH, Carvalho LS, Lleras-Muney A. Child gender and parental investments in India: Are boys and girls treated differently?.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2014 Jan 1; 6(1): 157-89.

课题：2025年度海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一般自筹项目）（Hnky2025ZC-18）；2023-2024学年春季学期中青年教师（科研类）培养项目（USYJSPY24-30）